

目 录 CONTENTS

本期专题·直面全球化

- 02 周小川：“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 03 朱民：特朗普国内遇挫 全球化将面临更大挑战
- 04 金灿荣：特朗普并非反全球化而是想重新划分分配格局
- 05 梅新育：不宜给特朗普贴“反全球化”标签

政坛经纬

- 07 把纪委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经济纵横

- 09 40亿元！共享单车押金谁来监管

人物春秋

- 10 政坛“常青树”文彦博的为官秘诀

文化漫步

- 12 造假的学科岂止语文 造假的世事又岂止教育

历史深处

- 14 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

悦读时光

- 封三 揭穿《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谎言
——关于《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部分（一）

编者按：全球化时代，人员流动日益频繁，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理解显得尤为重要。在文化领域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也成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情况下推动全球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上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在全球化进程受到一些非议或者在某些方面有挫折的情况下，中国始终坚持一贯的立场，维护经济全球化，支持自由贸易。

在过去的一年里，世界政治经济出现了较大的起伏变化，但是亚洲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并未受到较大的影响。不过，受世界经济影响，亚洲地区的贸易增长开始刹车，亚洲经济体在贸易、生产和金融等方面的一体化也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金融一体化倒退、内部市场狭小和服务业缺少竞争力等因素，给亚洲的未来带来不确定性。在挑战面前，应选择保护主义，还是积极采取共商共建共享的办法，走向命运共同体？

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化遇挫的背景下，有必要通过每年一次的博鳌年会，为全球化明是非、正视听，以更具包容性的新思路、新模式，激发人们对全球化的热情。

本期推出“直面全球化”专题，供您决策时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引起您阅读的兴趣。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周小川： “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



周小川在3月25日博鳌亚洲论坛“直面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全体大会上的文字实录。

主持人：请周小川行长从中央银行的角度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问题进行评论，并谈一谈政策协调的问题。

周小川：刚才，有人评论亚洲国家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中获益良多，亚洲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让我想到了中国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关于自由贸易战略和进口替代战略的激烈争辩。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意见倾向于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但在对国际经验进行比较分析后，大家均认为进口替代战略不会成功，因而实施自由贸易战略，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

我们可以从政治角度上来分析全球化，但全球化有其经济学上的原因。过去，由于运输和通讯等贸易成本较高，各国存在由于自然条件所形成的贸易保护，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地理上距离其他国家较为遥远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后来，通信技术和数字化迅速发展，运输和通讯等贸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员流动也大大增加。举例来说，中国现在每年出境人数以亿计，信息与人员的交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这些都是30年前无法想象的。

就像其他社会和经济问题一样，不管选择欢迎与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实，成为无法避免的挑战，我们必须直面这一现实。有些国家担心全球化会对本国就业产生影响，采取措施保护本国制造业。但从经济学上来讲，这违背（下转第6页）

朱民：特朗普国内遇挫 全球化将面临更大挑战

[导读] 3月25日，在腾讯财经主办的“融合·平衡——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博鳌午餐会上，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提到，特朗普医保法案因支持率不足投票被撤销，并不会让特朗普重新推动全球化。



3月24日，特朗普准备把他修改了多次的“医疗计划”递交国会去第一次批准。虽然最后有众院议长的支持，但最终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票数，而临时把这个医保法案撤销。

“特朗普说今年年底再说，能不能再说？”朱民认为，在可见得将来，特朗普的医保法案还会继续保留，因为这是对特朗普信任的一次公开投票。

朱民提到了一个美国股市发生的有趣变化：早上9:30股市开市时，由于预期法案会通过，美国股市出现上涨；但当白宫宣布法案撤出以后，股市急剧下跌了0.82、0.83个百分点。

“我昨天说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今天晚上一定把所有的股票全部抛掉。”朱民认为，因为特朗普医保法案支持率不足投票被撤销意味着：第一，这是特朗普的第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第二，特朗普

延续四个月的“特朗普预期”由此结束。

朱民提到，自2016年10月8日，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国债出现历史性上扬，美国通货膨胀的预期、股市和美元估值普遍出现上涨。“这个市场一片叫好，但我一直觉得市场过分乐观。”

朱民认为，2017年全球经济金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美国，来自于特朗普，来自于特朗普的说和行之间的差距。而现在又一次表明，特朗普说的和行动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针对特朗普此前说到的税收改革，朱民提到，如果过境税美国不能退出的话，美国公司税和所得税的改革几乎没有任何希望。而特朗普预期结束，市场就开始进入新的调整和波动，不可避免。

至于特朗普遭遇如此大的挫折，会不会改悔，重新推进全球化，朱民对此评价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在他看来，特朗普在国内的挫折，只会进一步加大他在国际上的反全球化的措施和倾向，加大推动贸易战的新举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化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朱民认为，全球化今天有两个基础是不可逆的：一是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已经构成了全球今天经济活动最主要的躯干，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离开全球的产业链可以活下去；二是全球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大大加强。

他还提到，未来全球化也是两条路：推进全球产业链的发展，特别是向深层次的、高价值的产业链发展；加强全球的国际组织如IMF这样的组织，来加强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修正和克服全球化可能引起一些不足的地方。



金灿荣：特朗普并非反全球化

而是想重新划分分配格局

上台不到一个月，特朗普新政已经初见雏形，除了否定前任，他还经常在推特上大放厥词，这样一个极具个性却不按套路出牌的超级大国的新舵手，会给世界带来什么？为什么美国人民会选择他？中美之间已有贸易战的迹象，特朗普是否会亲手点燃这场战火？这样一个处处树敌的新总统，能够顺利推行其政治主张吗？金融界网站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金灿荣，详解特朗普上台背后的深刻历史背景，深度分析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

【本期嘉宾】金灿荣，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美国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及大国关系等。

金灿荣：特朗普并非反全球化而是想重新划分分配格局

金融界：特朗普刚刚上台，就迫不及待的退出了 TPP，这个本来被认为是用来牵制中国的组织不敌特朗普反对全球化的决心，加上欧盟目前面临的困境，全球化真的走到尽头了吗？特朗普到底为什么如此坚定的反全球化？您如何看待特朗普身上的这个反全球化的标签？

金灿荣：全球化的基本逻辑还是经济逻辑，通过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实现人类总体的经济效益的提高，推动人类进步，从这个逻辑讲，全球化是合理的。

过去 30 多年的全球化都是由美英主导，而现在，这两个国家却成为了反对全球化的最主要的国家，从美国的角度看，人民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大部分收益都被华尔街拿走，而中产阶级和底层群众从中受益并不多；从国际上看，特朗普认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从全球化浪潮中得到的好处比美国更多。

所以，特朗普并非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而是希望有更公平的收益分配方式。当下的所谓的全球化危机其实是原来的主导者美国和英国要求重新算账，要按照他们的思路来搞。

从这个层面上看，全球化还会继续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围绕着主导权和收益分配还是会有斗争。

金融界：可是事实能如他们所愿吗？

金灿荣：特朗普是一个敢于冒险的人，他想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试一试。说白了，特朗普其实并非真的要回到“孤立主义”，而是要求之前的“小弟”来为美国提供的“保护”买单。（金融界）

梅新育： 不宜给特朗普贴“反全球化”标签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贸易摩擦是否会激化？中美贸易战将怎样开打？几乎从去年11月9日美国大选结果揭晓之日起，这就开始成为国际舆论热议的话题。

由于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贸易主管机构接连宣布了几项对华不利的贸易争端裁决，围绕这方面的议论还有升温趋势。但只要冷静客观审视，就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上台不仅带来贸易争端潜在压力上升的风险，也带来新的经贸发展机遇；即使中美经贸争端走到两败俱伤、大规模贸易战开打的地步，我们也有信心保持、乃至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里的相对地位。

首先，众多媒体给特朗普贴上的“反全球化”标签不完全符合事实。实际上，作为一个生意遍布全球多个国家的商人，特朗普对全球化利益的感受远比专业政客深刻。他针对的应是不可持续的现行全球化模式，而不是全球化本身。

其次，近来的一系列对华不利贸易争端裁决不能全算到特朗普政府头上。诚然，美国对华贸易争端压力有上升之势。据商务部统计，2016年全年美国对华合计发起贸易救济调查20起，比上年猛增81.1%，涉案金额37亿美元，同比增长131%。日前美国商务部就对华不锈钢板材反倾销和反补贴

“双反”调查终裁的税率之高，更堪称“变态”。但问题是，这些争端都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发起的。每项贸易争端从发起到裁决通常要一两年，能够算到特朗普政府头上的对华贸易争端还需要过段时间才能出现。

第三，特朗普从竞选以来围绕对华经贸发表的一系列刺激性言论，并不比当年极大推进了对华经贸关系的克林顿等人坏多少。特朗普的主张本质上是一个帝国在过度扩张后、以固本培元为目的的主动收缩，他是在以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术开展战略性退缩。也正因为他的根本目标是重振美国实体经济，夯实美国经济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上台给中国经贸带来的不仅仅是争端风险上升的不确定性，更有广大的潜在商业空间。

以中国经济当前的体量和“江湖地位”，如果发生无可挽回的国际性、世界性经济贸易下滑，我们不必徒劳地追求将本国增长率与历史数据纵向比较。只要能保证增长实绩与别国——特别是主要竞争对手横向比较好，我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上升、所占份额就会扩大，就仍然有利于我们“防范被赶超”。甚至，只要稳得住阵脚，多来一两场全球经济危机反而有助淘汰一些竞争对手。

试想：如果没有索罗斯老先生在1997年挑起

东亚金融危机,中国怎么可能那么在东亚新兴经济体中脱颖而出?次贷危机同样显著提升了中国经济贸易在全世界的份额:2007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10.8%、新兴市场的24.8%,货物服务出口占世界7.8%、新兴市场的23.2%;到2015年,中国实际GDP占全世界17.3%、新兴市场的30.0%,货物服务出口占全世界11.6%、新兴市场的31.7%。

尽管近两年全球贸易下滑,中国经济减速,但中国贸易占全球份额依然在提升。据世贸组织统计,以美元计价,2014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增长

0.3%,中国增长6.1%,美国增长2.6%,欧盟增长3.7%(其中德国增长3.4%),日本萎缩3.5%,被许多西方舆论捧为有希望赶超中国的印度增长2.5%。2015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萎缩13.5%,中国萎缩2.9%,美国萎缩7.1%,欧盟萎缩12.5%(其中德国萎缩11.0%),日本萎缩9.5%,印度萎缩17.2%。

既然如此,中国未来的贸易争端谈判对手们最好还是不要以为全面贸易战的恐吓就能把中国吓倒,有话好好说为妙。

环球时报 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上接第2页)资源配置理论。出台政策鼓励关键资源从一个部门转移至另一部门,这种资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质疑,对其他部门而言也是一种间接歧视。对于已实现一般均衡的市场,服务业和高科技等领域具备比较优势,如果将这些优势部门的资源配置到制造业,这种选择不能就说不好,但从数学优化模型上看是有问题的。

关于美国新一届政府正在酝酿的边境调节税,目前还不知道最终设计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励出口,并限制进口。但从中国改革开放多年的经验来看,要鼓励出口的话,应当允许出口制造商自由进口零部件和技术产品。如果限制进口,将难以在零部件、价格、科技和人才方面获得竞争优势,反而对出口造成歧视,不利于增加出口。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影音电子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原因在于我们采取了较低的进口关税,这令中国出口商在进口原材料和技术时有更多的选择,这些出口部门有可能在之后逐渐实现了部分进口替代,但也是基于市场竞争基础之上的。

关于金融和全球化的关系,如果进一步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其他开发机构贷款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电信业发展与数字化,这会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进程。

关于政策协调,我们可能需要更多时间予以考虑,基于当前讨论情况和政策形成机制,希望能在

7月G20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就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语言。

周小川:关于全球化,我再补充两点。

一是全球化对就业的影响。目前失业问题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国家失业率上升;二是劳动力市场本身不完善。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各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产业处于上升期,有些部门则出现衰退,劳动力需要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进行重新分配,这样,就会出现结构性失业。所以我们应该把资源向劳动力的再培训进行倾斜,对劳动力从知识和技能上进行重新培训,而不是把失业问题归咎于自由贸易。总之,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系中,资源配置主要是通过资本、技术等核心经济资源的分配来实现的。如果劳动力缺乏应有技能,或者劳动技能已经过时的话,就必须调整 and 更新才能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这是资源有效配置的要求,是无法避免的。

二是税收问题。这是个很技术的问题。如果美国考虑采用增值税,我们欢迎,但不能因为没有增值税就考虑征收边境调节税。因为美国有销售税,出口产品不纳销售税,但进口产品在最终销售时会征收销售税。边境调节税是对公司税的一种调整,而公司税主要针对公司利润征税,不同于增值税或销售税等间接税。这种以直接税的方式征收间接税的提法是很有争议的。



把纪委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 1 月 8 日在北京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全会一致认为,制定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是纪检机关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带头强化自我约束,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做到正人先正己的实际行动,充分表明了严格自律的担当和决心。

1 月 9 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监察部副部长肖培,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刘建超等解读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

谁来监督纪委?

怎样防止“灯下黑”?

中央纪委副书记吴玉良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部 240 人,给予纪律处分 223 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16.2 万件,给予纪律处分 119.9 万人;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 114.3 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 55.4 万人。2014 年以来,共追回外逃人员 2566 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 37 人落网,追赃金额 86.4 亿元。中央纪委高度重视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机关谈话函询 218 人、组织调整 21 人、立案查处 17 人,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谈话函询 5800 人次、组织处理 2500 人、处分 7900 人,做到了铁面无私。

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是为了防止“灯下黑”吗?吴玉良表示,全面从严治党,纪检机关必须把自己摆进去,从严管好自己,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监督别人的人首先要自觉接受监督,所以就针对纪检机关最核心的监督执纪权力,专门制定了规则,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扎紧制度的笼子。

吴玉良说,在中央纪委全会上审议规则,是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体现。六中全会的主题是全

面从严治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这次中央纪委全会通过规则,就表明纪委的权力有严格的监督,纪检干部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也展示了我们建设一支过硬的铁军的坚定决心。

那么,由谁来监督纪委?中央纪委十八大以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队伍建设,首先在纪检系统内部率先开展,另外,坚守八项规定精神,凡是纪检干部违反的一律曝光。中央纪委机关和省、区、市纪委设立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机构,以坚决的态度“清理门户”,加强队伍建设。这一次七次全会通过的工作规则,就是从纪律检查工作流程上设计制度规定,提出严格的要求,防止“灯下黑”。

这次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审议通过了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把纪委的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克服“届末之年反腐败可以收官”思想

一年前,2016 年 1 月 12 日举行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2016 年 12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一表述迅速被广泛关注。这一表述的变化,意味着党中央对于当前反腐形势的判断出现重大变化,我国反腐在一年间取得了新的进展。

新华社评论称,从“正在形成”到“已经形成”,一词之变,折射出的是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最新成果。

监察部副部长肖培表示,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科学判断形势,在 1993 年党中央作出的“依然严峻”判断基础上,加上了“复杂”两个字,叫“依然严峻复杂”。随着实践的发展,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摆上了战略布局,不断在深化、深入。

据介绍,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中管干

部是十七大期间审查中管干部人数的3.6倍,尤其是严厉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这样严重的违纪违法案件,严肃查处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消弭了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隐患。用数字说话,是“一降一升”：“一降”就是纪检机关目前接到的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呈下降态势。2016年比2015年接到的此类举报下降了17.5%,是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回落。“一升”,从纪检机关立案审查和处分的党员人数来看是持续上升的,在党员基数不断增长背景下,党员受处分率从1.8%上升到4.3%。

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刘建超表示,从2014年到2016年底,我国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共追回外逃人员2566人,其中“百名红通”人员追回了37人,追赃86.4亿元人民币。从新增的外逃情况看,也出现了逐年大幅度减少的趋势。“压倒性态势的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也在追逃追赃这方面。”

虽然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任务仍然比较艰巨,要克服“届末之年反腐败可以收官”的思想,要做到惩治腐败力度决不减弱,零容忍态度决不改变。

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播出

纪委的“内鬼”都如何作案?

纪委监督别人,谁来监督纪委?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召开前夕,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3集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播出了。在此之前,由同样班底制作的8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播出,全面讲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行动和成效。而《打铁还需自身硬》,专门从加强纪检干部队伍建设这个角度,讲述十八大以来纪委系统是怎么防止“灯下黑”“清理门户”的。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报道,专题片去年11月初开始正式拍摄,两个月拍摄完成。摄制组先后赴15个省(区、市),采访了30多名纪检监察干部,拍摄了10多个案件。专题片里出现的案例主要以中央纪委机关的案例为主,多数都是中央纪委机关被查处的干部。

党的十八大之后,绝大多数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贡献,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提升。

但也正是这种影响力,让一些纪检干部成为了被围猎的重点对象。纪录片中出镜的许多人曾经是办案能手、业务骨干,经办过多起大要案,却没能经受住腐蚀,利用手中的执纪监督权与官员和商人串通一气、牵线搭桥,最终身陷囹圄。

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原主任魏健,是十八大之后中央纪委机关首个被调查的厅局级领导干部。2014年5月4日,像往常一样来上班的魏健并没有想到,会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带走调查。魏健在中央纪委机关多个岗位担任过领导职务,参与查办过薄熙来案、戴春宁案等多起大案要案。经调查,魏健涉案总金额达数千万元,数额之大、物品之多,令人震惊。向魏健送钱送物的人员达到100多人,其中既有官员、也有老板,既有同学、也有同乡。魏健为人办事谋利达数十项之多,除了直接利用职务便利,借办案、核查线索牟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他更多的是通过向各地地方官员打招呼来帮人办事。利益输送的背后,自然是交易,而魏健能用来为人办事的,正是手中的监督执纪权。

袁卫华案是中央纪委机关查处的一起典型案件。这名37岁的处级干部虽然职级不高,但违纪行为却非常严重和恶劣。袁卫华曾经是家乡的高考状元,北京大学法学院高材生,大学毕业后直接考入中央纪委机关工作,曾经参与查办过慕绥新、马向东、武长顺等大案要案,也曾经立功受奖。袁卫华众多违纪行为中最为突出、最为恶劣的问题,是故意泄露案情。他不止一次将工作秘密拿来做交易,其中第一次发生在2004年,他主动向某副部级干部泄露举报内容。从2004年开始直到2015年案发前,他通过“卖案情”牟利,从官员手中“交易”工程项目,然后转给其父的工程队。11年间,承揽到工程项目总金额超过10亿元。

纪录片中除了10余位严重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现身说法,还有一些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而被追责的纪检监察干部也接受了采访。一个个鲜活的事例说明,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纪委不是天然的“保险箱”。纪检干部也并没有天生的免疫力,执纪者必须受到更严格的纪律要求,监督者必须受监督。

(徐豪《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3期)



40 亿元! 共享单车押金谁来监管

你交的共享单车押金去哪儿了? 能不能顺利退回? 有没有安全保障? 方兴未艾的共享单车带给人便捷, 更让人兴奋, 想必正处于兴奋中的许多人对其所交的押金一时半会还顾不上考虑。但是, 上述几个问题未必杞人忧天。

今年 1 月份, 摩拜、ofo 这两家共享单车的巨头宣布, 其各自的用户量都超过了 1000 万。据此粗略计算, 仅它们两家获得的押金就在 40 亿元左右。考虑到各家共享单车企业当前跑马圈地的势头迅猛, 预计 2017 年中国共享单车的用户数量将会突破 5000 万。届时, “押金”突破百亿元并不多么难。

很多人对共享单车怎么挣钱非常感兴趣也非常疑惑。难道它们的盈利模式就是 5 毛钱、1 元钱地零敲碎打? 假如你真这样认为, 那么你还没有互联网思维; 假如共享单车真的是依靠零敲碎打挣钱, 那么它们也根本称不上是互联网企业。尽管共享单车企业当前还没有清晰的盈利模式, 短期内也看不出它们有什么盈利的高招,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各个共享单车企业不仅是标准的互联网企业, 它们收取押金的方式也是标准的互联网思维。

共享单车的押金, 显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押金。我们通常碰到的押金, 基本上是一物一押; 而共享单车的押金却是一车多押。你只要开通一个账号并且用车, 就要交一份押金。这就意味着一辆共享单车, 同时对应着多份押金。几何级别的膨胀, 正是互联网企业典型的特点之一。一车多押的押金模式, 使得企业可以短期内汇集巨量资金。由此, 共享单车企业与其说是运营单车的企业, 不如说它

是运营资金的金融平台。

假如存在适宜的政策土壤, 目前共享单车企业完全可以转做互联网金融。毋庸置疑, 这种可能性对于任何企业都极具诱惑。

现实而言, 共享单车企业转型做互联网金融企业未尝不可。用户押金既可以作为单车押金, 也可以作为向共享单车这种金融产品的投资, 在享受共享单车便利的同时, 还获取一定的收益。同时, 企业可以用押金汇聚的这笔钱做相关运营。这样的想法其实并不新鲜, 不过是支付宝这类产品思维的延伸。但当前的问题在于, 共享单车企业身份未明, 它们也尚未获得做互联网金融的资格。目前它们收取的押金处境就非常尴尬: 用户将这么大一笔钱交给企业, 资金安全却没有保障。

假如企业倒闭了, 押金还能收回来吗? 一车多押的情况下, 企业是否有足够的流动资金能够应付用户收回押金的要求? 前几天, 中消协召集摩拜等 5 家企业召开座谈会。根据座谈会上的信息, 目前收取押金的共享单车企业一般将押金统一存放在银行进行专户管理, 且押金和充值余额均可退。但这只是企业单方面的承诺, 并无机制的保障。押金是用户个人的钱, 即便统一存放在银行, 产生的利息又是谁的呢?

共享单车的发展已经明显超越当前监管的水平, 既显现了互联网企业发展的巨大前景, 也暴露出诸多潜在风险。共享单车的押金其实正处在一个监管的空白地带, 尽管目前还不是什么问题, 但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管预案, 它早晚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徐冰 中国青年报 2017.03.28)

政坛“常青树”文彦博的为官秘诀

文彦博是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书法家。他小时候是一个“神童”，为官时是一位贤相。他能文能武，侍奉过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名君主，出入相达50年之久，封潞国公，堪称朝堂上的“常青树”。其藏器隐睿的为官之道让君主重视，其广举贤良的做法也为人称颂。

国家危难，他化风波于无形



文彦博自幼聪明过人，有一次，他和几个小伙伴一起踢球，一不小心，球掉进了一个树洞，树洞很深，怎么也够不到。大家束手无策，文彦博却很冷静，把水灌入树洞中，结果随着水位的增高，球也跟着浮了上来。

少年时，文彦博拜在颍昌（府名，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大儒史炤门下学习。天圣五年（1027年），文彦博就高中进士，那一年，他才22岁。

文彦博走上仕途后，凭借聪明的头脑、过人的机智，在处理一些突发性难题时经常灵光闪现，屡屡化解危机。

至和三年（1056年），仁宗突然病倒，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仁宗无子，事先也没有立储君，一旦暴薨，势必引起政局混乱。当时文彦博是宰相，向随侍太监史志聪询问病情，史志聪借口“禁密不敢漏言”，拒绝透露半点消息。

文彦博大怒，厉声斥责他说：“我等身为宰相，

肩负国之安危，怎能不预知皇帝的情况，何谓泄露机密？从现在起，你要随时报告皇帝的病情，不然就按军法处置你！”随后，他与同为执政大臣的富弼、刘沆吃住在皇宫里，以随时处理突发情况。史志聪又站出来反对说：“从来就没有这样的先例。”文彦博说：“这个时候，还能考虑有没有先例吗？”

一天深夜，有人突然叩打宫门，宣称要报告谋反的事情。文彦博唯恐有变，让他等天亮再说。第二天，文彦博详细查问，原来是一名禁卫举报上司都虞侯图谋造反。

此事非同小可，刘沆想逮捕都虞侯治罪，文彦博叫来都指挥使许怀德询问，许怀德担保都虞侯不会谋反。文彦博经过仔细调查，最后判定因禁卫与都虞侯结怨，所以诬告。他请刘沆写了份判词，随后将禁卫斩首以安定众心。

在仁宗生病的日子里，京城的官吏百姓都惶恐不安，正是靠文彦博等人的主持，大家的情绪才逐渐安定下来。不过谁也未曾料到，仁宗病愈后，刘沆却密报：“陛下身体不好时，文彦博曾擅自诛斩报告谋反的人。”

仁宗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文彦博，文彦博没有辩白，只是拿出了那份刘沆的判词，“帝意乃解”。不光善于化解国家的危难，同时也善于保护自己，文彦博超人的胆识，缜密的思维，让人望尘莫及。

仁让“政敌”，甘于人后不邀功

北宋皇祐三年（1051年），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时为宰相的文彦博，说他“阴结贵妃，专权任私”，证据是他任成都知府期间，曾赠送蜀锦贿赂张贵妃。

原来有一年临近上元节，张贵妃让时在成都的文彦博进献蜀锦，文彦博于是命人织成灯笼锦送进

宫中。唐介抓住这件事，攻击他“结交宫掖”，是因为走了“夫人路线”，才当上了宰相。仁宗很生气，各打50大板，将文彦博宰相职务免去，贬至许州（今河南许昌），把唐介也轰出朝廷，贬至春州（今广东春阳）。

过了4年，仁宗思贤心切，下诏让文彦博官复原职。不料，文彦博接到任命后却不愿意回去，还上书仁宗说：“您不把唐介也召回去，我也不愿独自启程。”

面对仁宗的不解，文彦博解释说：“唐介这个人自担任御史以来，其议论多数时候还是中肯的，虽然偶尔也有风闻参劾的失误，但总的来看，做御史还算称职，建议皇上起复任用。”唐介因此被召回朝廷，回到了监察御史的岗位。

这就是所谓的以德报怨吧，文彦博的大度让仁宗皇帝非常感慨。唐介更是为之感动，后来他被提拔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给文彦博当副手，两人“相知为深”，关系如知己般融洽。

仁宗病好后，文彦博和富弼建议早立储君，仁宗听从了他们的意见，从宗室中选定了英宗赵曙。后来英宗知道了这段旧事，当面对文彦博表示感谢：“朕之立，卿之力也。”文彦博却严肃地回答说：“陛下立为太子，承继帝统，是仁宗皇帝和皇太后的意愿，臣下没有什么功劳。而且陛下登基时我不在京城，是韩琦等人依照先帝遗愿拥立您的，我也没有参与。”

后来，英宗的长子赵顼，也就是神宗，也提起这段往事，对文彦博充满了感激之情。文彦博依旧回答说：“英宗皇帝天命所在，臣下有什么功劳可言？”神宗说：“虽然是天命，但也靠人谋，你品性深厚，不宣扬自己的善德罢了。”

给“包青天”当靠山，还敢叫板武将

在同僚中，文彦博与以刚正著称的包拯友谊最为深厚，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同榜故交，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两人都有正直无私的性格。

至和二年（1055年），包拯因保举不当，被降级罚俸，贬到池州（今安徽池州贵池区），心情十

分郁闷。包拯便给文彦博写了一首诗，引用西晋爱国将领刘琨“枕戈待旦”之语，表达了想热心报国的心志。

文彦博也给包拯回复了一首诗，其中写道：“名高阙里二三子，学继台城百六公。别后愈知昆气大，可能持久在江东？”暗示他，像你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是不会长期滞留在江东的。

果然，在文彦博的举荐下，包拯不久就回到了开封府的大堂。在传统戏曲里，有的说包拯有个大靠山是皇太后，也有的虚构出一个宰相王延龄，其实现实中最真实的靠山正是文彦博。

包拯疾恶如仇，文彦博也毫不逊色。康定元年（1040年），时任监察御史的文彦博曾审理了一件大案。

那一年，西夏进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北宋名将刘平率军与敌在三川口激战，监军黄德和临阵脱逃，致使宋军溃败，刘平身负重伤，力尽被擒。事后，黄德和为了逃脱罪责，以重金收买刘平的部属，诬陷刘平投降敌人，刘平一族200多口遭到逮捕。

文彦博奉诏查勘此案，经过一番仔细调查，很快查清了事实真相，得出了“德和退怯当诛，刘平方战而没，宜加恤其子孙”的结论。黄德和在朝中党羽众多，眼见事情将要败露，他连忙四处活动，居然说动朝廷指派其他御史来代替文彦博。

文彦博拒不交出案件的审理权，他对接任者说：“朝廷是担心我无法做成判决，才派你来代替。现在我已经做成判决，如果有任何误差，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同你没有任何关系。”最终，黄德和被腰斩，刘平则被平冤昭雪。

文彦博无疾而终，享年92岁。在充满着险恶与沉浮的官场，这是一个让人惊异的年龄。

宋神宗也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问文彦博：“你有养生之道吗？”他的回答是：“无他。臣但能任意自适，不以外物伤和气，不敢做过当事，恰好即止。”“任意自适，恰好即止”，八个字道出了他长寿的秘诀，其实也是为官的秘诀。

（河南日报 王爱军）

造假的学科岂止语文

造假的事又岂止教育

导语:关于学生教材中“假课文”的质疑和争论由来已久,近日又成热点之势。人们批评这种造假,怕影响孩子的价值观;也担心背后的德育化思维,污染了文学原有的独特价值。评论人葛璐,是处在语文教学岗位上的实践者,在她看来,小学语文的首要任务是识字,编撰一些适应小学生的简单易懂的文章是有必要的,但必须建立在真相和常识的基础之上。虚构作品可以采用,但虚构不等于作假,很多小学课文的根本问题在于,虚构的不彻底性以及对他人的刻意神化倾向。用虚构的人物来虚构故事,这种虚构反而是真实的,而让真实的人物进入虚构故事,这却是真实的作假。用虚假的事迹来包装真实偶像进行启蒙,一旦被发现有假,偶像基本全盘坍塌,与之相应的启蒙只会走向反方向。与此同时,社会和家也不必要过分夸大几篇课文的作用,将教科书作为绝对权威故而不允许有任何瑕疵,这种思维本身也是一种绝对的一体化思维。而且不同的教学模式也会对内容产生影响,死板的教学,无论课文是真是假,最后都只会变成死课文。教材改革正在呈现多元之势,这是一个好现象,但也应该保持清醒,无论怎样多元,永远不可能出现一套完美的教材。况且造假的学科岂止语文,造假的事又岂止教育。

近日,《校长怒了!还有多少假课文在侮辱孩子的智商?》一文在网上再次引发了关于假教材的探讨,文章提及某教版二年级语文书中的《爱迪生救妈妈》一文与历史不符,课文写7岁的爱迪生想出了用镜子聚光的办法,让医生在家里完成阑尾炎手术,救了妈妈。而据考证,爱迪生7岁那年是1854年,世界上第一例阑尾炎手术1886年才有,这是一篇杜撰的“假”课文。



撰的“假”课文。

与此同时,一大波“假课文”被挖掘出来:

《华盛顿与樱桃树》一文据考古学家考证,华盛顿童年所住的房屋位于弗吉尼亚州的拉帕汉诺克河边的陡壁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里曾种植过樱桃树。

《乌鸦反哺》不忘哺育之恩的故事,据说生物学证明乌鸦没有这种习性,将鸟类的这种行为模式解释为报答母恩,是一种道德绑架。

……

这个话题并不新鲜,多年前早就引发过争议,而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发酵一次。假教材现象也并非个案。几年前,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成立了专门的调查中心,在美国12种最为普及的教科书中发现了几千处错误:赤道从美国南部穿过,自由女神像是左撇子,体积等于长乘以宽等等,调查人员称约有85%—90%的美国中学生使用着这些教材,难怪美国学生在科学标准化考试中的成绩要落后其它国家的学生许多。

被质疑的假课文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违背历史史实、生活常识的科学之“假”,一种是创作需求虚

构的“假”。教育部门每年都在向一线教师征集教材疏漏之处及时更新,事实上,目前国内教材中科学性的错误已经算少的了。这些课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小学课文。中学课文里多是大家之作,很少会引发巨大争议。

有人质疑在人类浩瀚的文学长河中,为什么小学课文就不能挑一些经典的表现类似思想的文章呢?这种质疑脱离了小学教学的环境,经典当然有,只是大部分小学生还不识字读不懂。小学语文的首要任务是识字,必须编撰一些适应小学教学任务的简单易懂的文章。既有编撰,便易失实。编撰过程中的作假和虚构不是一个概念,对于前者,必须打假,而后者属于创作技巧层面的优劣。

语文不是历史,需要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且语文常常也不是文学,关于语文学科本身的“去道德化”、“去德育化”早就引发过热议,很多一线执教者并不希望语文课堂本身承担太多的德育内容,语文是所有学科中最接近德育和政治教化的一门学科,常常是隐形的德育课和政治课,很多课文希望通过名人的故事打造出社会正面形象,给孩子传递积极正面的思想价值观,编纂者也可谓是“用心良苦”。

语文课文的编撰要义首先是启蒙,其次才是文学。虚构类文章同样可以达到真实的启蒙效果,但问题在于,当虚构文学被“德育文学”捆绑之后,引起家长愤怒和担忧的就不简单只是教材课文内容方面的虚构漏洞,而是这种虚构背后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如果教材里的爱迪生、华盛顿换成普通的路人甲乙丙,那文章就丝毫不会存在明显的史实问题,用虚构的人物来虚构故事,这种虚构反而是真实的,而让真实的人物进入虚构故事,这却是真实的作假。很多小学课文的根本问题在于:虚构的不彻底性以及对于名人的刻意神化倾向。打不死的战士黄继光、舍生取义的董存瑞都被揭发存在偶像造假,这跟雷锋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偶像,一个普通人的传奇更难书写,用虚假的事迹来包装真实偶像进行启蒙的后果在于:一旦被发现作假,这个偶像基本全盘坍塌,与之相应的启蒙只会走向反方

向。

教科书的权威性令其成为官方意志的代表,真正令大众敏感的是权威意志的作假以及这种机制灌输给孩子们的核心价值观。有家长提出课文如果是虚构的,至少应该注明“本文纯属虚构”,恰恰就是担心在这种一味为了追求德育效果,神化名人而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倾向。对于语文学科,这看似无可厚非,但对于教育本身,这却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如果课文这个传递的载体是虚假的,那么传递的崇高价值观还可信吗?

即使是虚构文学,语文课文也应该建立在真相和常识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当懵懂的孩童成长为能辨识真假的成人时,真相打破虚假的那一瞬间才不至于显得那么崩塌。

有人认为,假课文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是非判断的缺乏,侮辱了孩子的智商。具有这种忧虑的家长又未免太不自信了,如果孩子的智商是几篇假课文就可以“侮辱”到的,那这首先绝不是学校教育的失败,而是家庭教育的失败。圣经等宗教里也有很多杜撰的假故事,并不会妨碍人们的宗教信仰本身,人们也不会因为《二十四孝》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就去否定孝道本身,反而可以引发出一些与时俱进的探讨。同样,难道因为学了一些假故事,就会毁灭孩子未来对于真善美本身的信仰吗?

因为,传递的过程远比传递的载体更为重要。将教科书作为绝对权威故而不允许有任何瑕疵,这种思维本身仍然是一种绝对的一体化思维。语文教科书绝对不该是为了告诉学生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而存在的。正如教育家叶圣陶所说:语文教材不是目的,而是“举一反三”的例子。

同样是一篇课文,不同的教学模式下差异太大。死板的教学模式永远只会走套路:介绍作者,分段,分析修辞手法,概括中心思想……这种方式下,无论是假课文还是真课文都只会变成死课文。家长压根无需担心学生,因为他们根本不会走心。

随着教育方式的多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声音,对传统一体化教育模式质疑甚至反叛,清北复

有关田家英的若干史料辨正

核心提示:戚本禹说: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田家英是“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自杀的高级干部,他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标志“文革”全面发动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通过第一个“文革”纲领性文献《五一六通知》的会议)还未结束时就自杀了(23日)。众所周知,田家

英当时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特别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他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因此,他的自杀是震惊全党的大事。

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是怎样自杀的?迄今45年

过去了,这件事仿佛还未取得完全的共识。而真正厘清这件事,对了解“文革”乃至高层政治都是十分重要的。

是毛泽东秘书,也是毛的忘年交

田家英1922年1月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3岁丧父,9岁丧母,11岁被迫辍学,在哥嫂开的中药铺做学徒。田家英生性喜爱读书,在辍学的日子里,靠着一本字典通读了《资治通鉴》、《史记》和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性格倔强,不甘听凭命运摆布。他的床头挂着一副对联,“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1935年,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不断发表诗歌和文章,在川中被称为“神童”。“田家英”这个名字就是他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

田家英在中学读书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与同学经常到街头茶馆宣讲抗日、散发传单,还参加了由共产党员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海燕社”,因此被学校开除。1937年11月下旬,田家英和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告别故乡,踏上了去延安的路。12月到达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2月,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田家英相继在马列学院、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宣部等单位工作。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

英的教授抱团组建私学轮番教授孩子,私学的民间声音亦会促进官方话语系统的让步,这是社会的进步。如今教材也逐渐多元,但无论怎么多元,永远不可能出现一套完美的教材。

笔者最近恰好在教一篇课文:《卖柑者言》。明朝一个卖橘子的人,他擅长贮藏柑橘,放一年也会烂,放到市场上,比别人高出十倍的价钱,人们还争先恐后地购买。一个人买了一个尝尝,切开发现里

面早就干得像棉絮一样。他就质问卖橘子的人,你太过分了!而卖橘子的人却回答说:“吾售之,人取之,未尝有言,而独不足于所乎?世之为欺者不寡矣,而独我也乎?”

姑且斗胆再续上两句:世之为欺学科不寡矣,而独语文乎?世之为欺之事亦不寡矣,而独教育乎?

(2017-03-22 凤凰网 凤凰文化葛璐。作者为中学语文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现代文学硕士。)

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奴才的见解》、《从侯方域说起》等文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



泽东特别赞赏，虽说那只是千余字的杂文，但从中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思想。文笔如此老辣深沉的作者竟是一位

20多岁的小伙子，这让毛泽东颇为感慨。自那以后毛便注意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国外，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教他历史、语文。这时毛泽东很自然地想到了田家英——田熟悉文史，又与毛岸英同庚。就这样，田家英当起了毛岸英的老师，与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

1940年代的最后几年，国共两党大决战的时刻，也是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异常繁忙，需要增加新秘书。1948年8月，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26岁的田家英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深得毛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身边工作，更是深受熏陶与感染——两人有许多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了忘年交。

毛泽东有夜里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努力适应毛泽东，与他同步工作。1961年11月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准备睡觉，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作者、出处等。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这让毛泽东非常高兴。毛经常让田家英做这类事情，他都做得很好，满足了应急之需。

这里顺便说一件事情。近年网上传播一个说法——1995年6月，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党校联合向中央书记处提出《关于〈毛泽东选集〉中著作原稿的审核、考证意见》的书面报告，该报告称：“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审核、考证，发现在《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160余篇著作中，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只有12篇，经毛泽东修改的有13篇，其余诸篇全是由……(别人)起草的。”必须郑重指出，这个所谓报告及其内容完全是谎言。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写文章是不让别人代笔的。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不仅会写文章，而且是大手笔。他自己在1964年一次中央会议上就明确说过：“我写文章从来不叫别人代劳，有了病不能写，就用嘴说嘛。1947年写《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时，我病了，就是我说别人记的……”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也希望和要求其他领导干部这样。当然也有例外——例外之一，就是八大的开幕词是别人替他起草的。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所致开幕词，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多次被掌声打断，会议中间休息时，许多人还对开幕词啧啧称赞。毛泽东不掠人之美，坦然地告诉大家：“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八大开幕词中有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田家英起草八大开幕词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十分满意的一句话。这句话，必将和古人说的“满招损，谦受益”一样成为不朽的格言。

特别需要指出，田家英为编辑出版毛泽东著作立下了很大功劳。他参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的全部编辑工作，还主持编辑供广大青年和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同时，协助毛泽东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选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注释，是田家英主持撰写的，其中一部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和定稿。四卷《毛泽东选集》出版以后，田家英和其他同志发现注释中有不少疏漏和不确的地方，从1962年起，他主持第一卷至第三卷注释的修订工作。田家英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宣传和介绍毛泽东著作的。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

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上，真正做到了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田家英经历过长期的革命锻炼，是很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在思想品质上，他诚实、正派、有骨气，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作为毛泽东的秘书，他敢于向毛泽东反映基层的真实情况，对重大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也敢于提出自己的建议。田家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自杀之谜：当事人的回忆

但这样一位好干部为什么在“文革”还未全面开始时就自杀了呢？这个问题应该述说清楚，否则就成了历史上的永久之谜。众所周知，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很多，而影响最大、最值得重视的恐怕是胡乔木的说法。我不揣疏漏和冒昧，大着胆子就以胡乔木的说法为例谈谈此问题。

最近，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丁晓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一些报刊不断选载和介绍，被称为是一部“评价公允”、“真实可信的优秀传记作品”。该书关于田家英之死的情况叙述如下（转引自8月12日《作家文摘》）：

被加上“篡改毛主席著作”罪状的田家英（指在整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的谈话时，田家英主张删去“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词句——笔者注），早在1962年就被江青第一个戴上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帽子。这次又得罪了江青，厄运终于降临。1966年5月22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来到田家英在中南海喜福堂的家中，宣布罪状，停职反省，逼迫其限时刻搬出中南海。“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痛苦地在5月23日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丁晓平的书认为迫害田家英致死的首要责任人是江青，具体执行者是王力、戚本禹，他们到田家英家中，宣布田家英罪状，要他停职反省，逼他搬出中南海，他因忍受不了这种屈辱才自杀。当然，作者是沿用胡乔木的说法，但事情果真如胡乔木所说的这样吗？江青对田家英之死无疑有责任，不过我没掌

握确实材料，没法具体说明；但说到直接导致这一悲剧的王力、戚本禹，他们对这件事情都有详尽的说明——若不因人废言，从“法律”上讲，也应该听听“被告”一方的意见。这里顺便说一下，胡乔木说王力、戚本禹1966年5月22日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不准确，因为中央是1966年5月28日才发布通知宣告中央文革小组成立的。

下面，先看看2001年出版的《王力反思录》中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

（一）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检查以后，会上讨论对四个人的处理。罗瑞卿不在这个会上处理，由军委处理。大约是20日，少奇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组（那时不叫专案组）处理彭、陆、杨、田（家英）的问题，总的组长是周恩来，下分四个分组，彭、陆、杨、田各一个分组。彭组由周恩来自己负责，陆组陈伯达负责，杨组康生负责，田组安子文负责。

（二）安子文分组的成员是我和戚本禹。21日或22日，安子文突然打电话通知我和戚本禹到他家里去，坐他的车到田家英家里，怎么谈事先没商量，是安子文一个人谈的，我和戚本禹都没说话。我认为安谈的还是相当缓和的，不是那么气势汹汹。安对田说：“中央认为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不适宜担任现在的工作了，暂时由戚本禹负责。中央要你马上把有关毛主席的手稿、文件、编进毛选的原稿、印的东西清理一下，全部交出来。”这当然实际是撤职，这是毛主席决定的，少奇、总理都不能决定。

（三）23日继续开会，就在这个会上，汪东兴接了个电话后很紧张地跑到主席台上跟总理说，田家英自杀了。总理马上要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立即赶到田家，这时田家英已经不能救了。他喝了一瓶茅台酒然后上吊。事先把公务员打发出去，布置了一大堆任务，很长时间才能回来，他自己倒锁了门自杀。等公务员回来敲不开门，最后报告中办把门撬开，把田家英放到地上，已经没有希望了，我们去时已死了很久。安子文光叹气，有话可以向组织上说嘛！我和田家英是朋友，私交很好，在文物方面有交往，我

觉他死得很可惜。戚本禹也吓呆了。戚本禹对田家英一直很好，戚被打成右派，是毛主席让田家英解放他的，而且把他调到要害部门工作，田家英是他最大的恩人。戚对田家英的旧情还是有的。总之当时对田家英之死都感到惋惜。

(四)田死后当天下午，安子文找了我、戚本禹、董边(田家英的夫人——编者注)，到中央组织部谈田家英死的经过。董边说，头天夜里田家英说了一句话：“中央把我当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我看是当成敌我矛盾了。”她说，她当时没有注意这句话，没有向组织汇报。7月份江青回京前，我们就听到传达江青的话，说陈伯达、康生(实际上是说周恩来)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让田家英自杀了？江青回来后又骂了好几次，说对田家英处理不果断，早就该隔离。她是把田家英当成敌我矛盾了。

(五)田家英之死的经过就是这样。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刊载胡乔木的文章，说“王关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五月二十二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田忍受不了这种污蔑和侮辱，不得不含冤去世。”这种说法完全违背事实。

再来看看戚本禹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戚本禹2002年写了《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一文，着重批驳“荒诞无稽的流言”。同时，该文也说明了田家英之死的情况：

(一)1966年5月21(22?)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唯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逢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

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逢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逢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反省不要出去了。”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逢先知都没说什么话。

(二)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逢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

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三)深夜电话事件后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23日上午八九点,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小陈出去买香烟和其它东西,自己则走进永福堂西厢,即毛泽东的藏书室,锁了门,然后把头悬在一根拴在两个书柜之间的带子里,自尽了。约十时许,小陈从西单回来,发现田家英自杀,他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从窗口跳进藏书室,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和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

于是,他们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向正在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我和汪东兴等报告,我们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接着安子文、王力、汪东兴等坐车赶回中南海观察现场,处理后事。安子文当时还通知了董边,董边很悲伤,但她没能赶过来。田家英在解下时,舌头外伸,脖子上有印痕,明显属于自缢。当时到现场的人,无论是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还是中央领导人,谁都没有发现他身上有枪伤,也没有在毛泽东的藏书室或田家英的办公室发现任何血迹。当时所有到场的人都感到田家英不该这样,没有人幸灾乐祸的。

除了上述内容,戚本禹一次和我通电话谈到胡乔木关于田家英之死问题的说法时,愤怒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戚还说,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戚认为,田家英既不是魔鬼,也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实际上,应该说田家英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但又很有思想,有能力,才华横溢的十分难得的中共高级干部。

行文至此,我们小结一下。

(一)从王力和戚本禹的说法中,可以看到,关于田家英之死,他们二人所说的情节基本是一致的。有所差异,无关宏旨。事实只有一个。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胡乔木说的符合事实,还是王力、戚本禹说的符合事实?当然,我说的符合事实,是说基本上符合

事实,谁也不能肯定人们事后的回忆完全准确。事实上,已有人指出:“戚本禹的大部分叙述是可信的,但也有小部分记忆不够准确。”(2011年9月6日王凡给我的信)我相信,通过本文提供的材料,关于田家英之死的真实情况,人们会做出比较客观和公正的判断。

(二)从王力的说法中我们看到,他直接和明白地说,在田家英之死问题上胡乔木的说法“完全违背事实”。既然在10年前(2001年是出书的时间,实际王力所写时间应该更早)王力就指出了这件事情,而现在出版的书谈到这个问题时,根本不顾王力的指正,对此不置一词(就是批驳也好嘛),径直照抄胡乔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说法,这不应是历史工作者和研究者之所为。

(三)在1966年5月处理田家英问题时,本来负责人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是跟着去的,只是成员或随员,胡乔木却说成“王力、戚本禹等三人以中央代表为名”,根本不提安子文,这是为什么?这种做法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相距岂能以道里计?

他为什么自杀

上面所讲主要是田家英自杀的过程和情况,至于为什么自杀,谈的似乎还非常表面,没有触及实质。胡乔木说田自杀是因为“忍受不了诬陷和侮辱”,这是一句空洞的话头;我们看到安子文和田家英谈话,只是说中央认为他犯了严重错误,要他停职检讨,并没有什么“诬陷”和“侮辱”的语言。所以田家英究竟为什么自杀,还需进一步探讨。

在一次会议上,遇到田家英的朋友李锐老人,因他耳聋,我大着嗓子问他:“李老,请问您: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李锐不假思索,脱口而出:“毛主席不要他了嘛!”除此他再也

没说什么。
2008年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也讨论过这一问题。他说田家英自杀除了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外,最主要



和最根本的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我觉得戚本禹说的和李锐说的是差不多的意思。

2004年10月30日，凤凰卫视“鲁豫有约”栏目曾约请田家英的女儿曾自回忆她父亲田家英，曾自在谈到父亲的死时是这样说的：

父亲最后的遗言：“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我觉得父亲有一种极大的失望，他追求的事业，他一生献给主席的热爱，觉得主席最后把他否定了。我认为这是他结束自己的最主要的原因。他如果觉得主席把他抛弃了，他就觉得没有希望了。他觉得主席对他形成概念了，把他划成敌人了。

文史学者王凡在给我的来信中，谈到田家英的死因，说：“我觉得是多重的，当然毛泽东的不信任和把他划到自己以外的阵营，是最重要的原因，这等于宣布了他政治生命的完结，而且他清楚这个‘宣布’的结果，（他住的）永福堂的前一位居者是彭德怀。”（这与戚本禹说法同，这二人都是在中南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说的可信；《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书中说田家英住“喜福堂”，不对，或许是笔误——笔者注）

我问戚本禹，毛泽东为什么不信任和抛弃给他当了将近20年秘书的田家英呢？他明确回答：这主要是田家英和刘少奇的关系。他说，毛泽东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副主任，当毛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田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田给刘少奇打电话，询问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主席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

在这次和戚本禹见面时，他还说了—一个情况：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一次中间休息时，总理跟我说，主席意见，要你接替田家英中办秘书室的工作。我诚恳地跟总理说，我事情挺多，忙不过来，再说我的能力，怕胜任不了。总理亲切和

蔼地说，这个问题中央已经定了，至于工作会有人帮助你的。

戚本禹说：

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不能“结交诸侯”这句话。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听到这些话，不禁想到笔者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

若问这一切究竟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同舟共进》阎长贵 作者为山东聊城人，生于1937年。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机要秘书，后被投入秦城监狱近8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调回红旗杂志社工作。）

◆延伸阅读：

从侯方域说起

田家英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

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上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四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

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束奴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作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不过侯方域究竟是一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晚年写作虽处处在避免触着新主的隐痛，言文早已含蓄婉转，但也还有一二精辟的意见。比如在《与李其书》，论到统制言论的问题：当天下分裂之际，倘朝野清议犹存，则其乱暂；若夫骨鲠在喉不能吐，直言苦口不得陈，则国尚何可为！

这意见是大致不错的。古今中外的史实都在证明，临到国破世乱，民族在生死中挣扎时，我们常见的倒不仅清议不存，且正是混淆黑白的言论充斥不堪。明末如此，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何尝不如此。近一二年来，国内言论的道路不正是愈来愈为险窄，也愈来愈为魑魅吗：不准写，不准看的明法暗规很多很多，坚持抗战进步的文字被删削到不知所云，人民的喉舌在重压下面，萎缩干枯以至于死。收买，威迫……一切昏愤无耻法宝的使用，正在“方兴未艾”呢！

而这，还有“以宣传对宣传”的一面。——其实不稳当的言论早已或是逼死，或是困难发行，那里还有“宣传”可“对”，应当叫做独家专卖了吧。就以近两月的来看：有的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题目之下，大家谈梦说幻，写出的理想不外坐汽车兜风于绿荫蔽行的大路之上，卧躺椅喝冰淇淋于斗室之中等等之类。有的正在研讨中国作家中那些属于“技巧派”，这回连“汪政权”下的文化小狗穆时英的大文也捧出来“示范”。除开“艳史”，“秘闻”，身边琐事，那“经国大业”是：有的写作“中共党史”，结论自然是共产党历史太不清白。激进的主张：“先瓦解八路军，以后扫荡边区”。稳重的在“从历史的叙述，政策的检讨，以及革命性质的分析中”，“证明中共参加国民革命而又破坏居民革命是必然的”，“除了最后解决外，没有其它办法”。噉噉喳喳，说是在说“良心话”了，其实真使人分

不出人言还是鬼语。翘起一条尾巴，算做一面大旗，萃聚几名同类，便有书报期刊，冲杀上阵，浩浩荡荡。……这样清议不存，鬼论塞道的原因，侯方域是不了解，或者了解了却未便名言，他只客客气气地带过一笔：“夫门户日深，水火日急也。”他自己参加过明末的“门户”“水火”，这里自然有点“忏悔”的意思。其实真像不在“日深”“日急”，而是有人恋着自己的权势；防制蚁民翻身，需要设备格杀异端的绞架，维持秩序的监狱，也需要颠倒是非的言论，对付“纷歧错综思想”的方法，是与防制异己的政治同时存在。

结果是弄到青年学生无书可读。侯方域在同文另一段说：“青笈之悬，士论诋之。”这说的是阮大铖得势之日，禁止复社文字流布，自己却“付梓”了许多文存，但当时士林都以案置这类文籍为耻。若干年来中国人在欺骗愚弄之下，从别人说谎、自己受骗中间，已经生长成了智慧和聪明，已经具备了生存的起码常识：凡他们惧的、骂的、禁的就是好的；凡要知道这事实的真相，就首先不相信他们的悦论与正言。

深夜烛光摇曳中，偷读禁书的青年很多，到官办书坊购买几册的却是太少。尽管编辑先生一再捏言“本刊近来接到香港以及国内各地来信很多，读者爱护之深，使我们感愧”；订费一再跌价，“减轻读者负担”；其实那怕贬价到零，派订还附送画报，也难博得阅者正眼相视。表面在假装热闹，骨子里的空虚和荒凉是显然的。

（原载 1942 年 1 月 8 日延安《解放日报》）

侯方域(1618 ~ 1654)清代文学家。字朝宗。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侯方域少年时即有才名，参加复社，与东南名士交游，时人以他和方以智、冒襄、陈贞慧为四公子。侯方域擅长散文，以写作古文雄视当世。他早期所作文章较浅薄，功力不深；后期日趋成熟。时人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国初三大家。他的作品有人物传记，形象生动，情节曲折，均有唐代传奇笔法，具有短篇小说特点。其论文书信，或痛斥权贵，或直抒怀抱，都能显示出他的散文具有流畅恣肆的特色。也能诗。著作有《壮悔堂文集》10卷，《四忆堂诗集》6卷。